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与“直过”民族村落脱贫路径探析——以云南拉祜族为例¹

高杨^{1,2}，刘永功²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济南 250011; 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4)

【摘要】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针对我国贫困问题提出的科学的系统理论。我国“直过”少数民族虽然从原始社会形态过渡到现代社会形态，但由于长期空间隔离和思想观念落后等原因仍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因此也成为当前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本文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体系为指导，以云南边境拉祜族村落为例剖析了“直过”民族贫困的原因，提出了培育脱贫内生动力，快速融入现代市场等多种途径摆脱贫困的建议。

【关键词】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 “直过”民族 脱贫路径 深度贫困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扶贫。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从 1978 年的 97.5%，下降到 2016 年的 4.5%，贫困地区的发展和减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减贫历程中，虽然大规模扶贫开发通过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而带动大批贫困人口脱贫，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截至 2017 年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 3046 万人。现有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边远山区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广度缩小但贫困深度加深，致贫因素复杂，扶贫难度大。^[1]

根据云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云南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43.4%，云南省特有的 15 个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约 191.8 万人，贫困发生率 28.2%，高出全省 15.5%。少数民族“直过区”作为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其脱贫攻坚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云南省还有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颇、傈僳、拉祜、佤 9 个“直过”民族，分布在云南 13 个州的 1179 个行政村，总人口 232.7 万人。在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上，民族“直过区”由于边远和封闭的空间地理特征，使其成为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一个特殊贫困区域。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直过”民族虽然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但由于区位、历史、文化等多种原因，成为云南省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与其他民族相比，“直过”民族具有“三个最”特征：最贫困地区、最特殊族群、最弱势群体。^[2]

在我国，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惠及贫困人口是过去开发式扶贫的主要理论支柱。涓滴理论认为社会财富有一个自然渗漏的过程，政府不需要对分配进行干预就能够实现社会平等。如 Aghipn 和 Bolt-on 认为富人的财富积累最终对贫困人口带来好处，这个惠及机制就是涓滴效应。^[3]也有学者认为，信贷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支持和公共产品的做法能够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提高经济增长。^[4]与涓滴理论相适应的罗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提出，

¹作者简介：高杨（1991-），女，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管理，农村社会变迁与减贫；刘永功（1959-），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规划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合作“十三五”规划课题（201507211210412），项目负责人：刘永功。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大规模投资从而形成资本才能摆脱贫困恶性循环。^[6] 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引导政府通过促进投资，实现市场化来推动经济增长以达到减贫效果。然而，针对我国当前贫困问题向深度贫困地区集中的趋势，依靠经济增长“涓滴效应”的粗放型扶贫机制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直过”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发展差距，开发式扶贫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当前许多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倡导的精准性和效率性能够有效弥补民族地区原有扶贫制度不足，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绩效。^[6] 也有学者从机制矫正的角度，论述了精准扶贫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陈成文认为“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矫正机制的设计必须立足于顶层设计、实践操作和结果评价三个维度。”^[7] 因此，直接针对深度贫困人口的更加“精准化”的扶贫干预方式成为当前脱贫攻坚的必然要求。

在支持精准扶贫的相关理论基础中，社会精细化理论具有代表性。这个理论提倡通过实施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脆弱和贫困问题。^[8]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社会精细化理论在我国的扶贫实践，它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脱贫发展的根本指导意义在于，采用“六个精准”直接瞄准地处偏远、边疆和生态脆弱区域的最脆弱、最贫困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村落，有针对性的采取符合少数民族人口贫困特征和发展特点的扶持措施，采取超常规的扶持力度。汪洋副总理在云南专题调研“直过”民族扶贫工作中强调，“‘直过民族’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战略部署，从‘直过民族’实际出发，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采取超常规举措，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坚持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9]

总之，“直过”民族村落脱贫是脱贫攻坚、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据统计，截至 2016 年，云南省仍有 9 个“直过”民族，18.73 万户 66.7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何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构建“直过”民族等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路径，是我国在“十三五”脱贫攻坚阶段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补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核心内涵的解读

“精准扶贫”思想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以往粗放型扶贫模式而言，精准扶贫更加实事求是、因乡因族制宜，为了确保精准扶贫有效实施，做到“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精准扶贫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脱贫攻坚“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针对我国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进一步指出“六个精准”具体包括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扶贫要求^[10]，从而更加强调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上体现出的精准化和针对性。

（一）精准识别

“六个精准”的“扶贫对象精准”是“精准识别”的集中体现，是后续扶贫工作开展的前提和保障。扶贫对象瞄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针对贫困人口“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11] 按照政策要求，贫困户识别遵循：“农户申请-村民代表大会评议-乡镇审查-县审核”及各行政村的“两公示一公告”。通过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将真正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纳入到扶贫对象中。在贫困户的识别过程中，应综合考虑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杜绝“精英俘获”、“寻租行为”等现象的发生，真正将扶贫工作从以往的区域性开发式扶贫向贫困户、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转移。按照以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真实可靠。

云南省在“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攻坚推进会议上承诺，“全面小康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掉队，一个都不能少。”云南省在建档立卡数据库的建立和“回头看”工作中，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制定出具有本省特色的贫困户新增和退出机制——“五查五看”，即：查收入，看家庭收入来源的结构稳定性；查住房，看住房的安全稳固性；查财产，看贫富程度；查家庭成员结构，看能力和负担；查生产生活条件，看基本生产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组织好“三评四定”，即内部评议、党

员评议、村民评议，村委会初定、村民代表议定、乡镇审定、县确定。云南省少数民族“直过区”建档立卡 18.73 万贫困户 66.75 万贫困人口，是“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二）精准帮扶

“精准帮扶”在习近平精准扶贫“六个精准”扶贫要求中与“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相对应。习近平认为扶贫开发应当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力量，“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12]其中，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始终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各项惠民项目、新增涉农资金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增加金融投入，资本市场为深度贫困地区的企业提供便利服务，降低企业成本，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另外，政府作为扶贫开发的主体，最终要责任到具体岗位上的行政人员，才能保证深度贫困脱贫政策的最终有效落实。习近平指出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责任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以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真正的将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在扶贫实践中尤其要将关注焦点放在基层一线，加强贫困村两委建设，充实一线扶贫工作队队伍，将脱贫攻坚实绩纳入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考核指标，激发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怎么扶”的具体路径，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精准扶贫的途径主要包括：（1）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解决贫困问题的具体方案。（2）以面带点。即以区域整体发展带动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引进和布置对贫困人口受益更大的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3）先富带后富。继续要加大东部发达地区和中央单位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对口帮扶工作，强化帮扶责任，坚持“谁的孩子谁抱”的原则，加大在资金、项目、人员方面的投入力度。东部经济发达县要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县“携手奔小康行动”和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携手共进。（4）培育村民脱贫的内生动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培育贫困地区劳动者的内生动力才是根除深度贫困的解决之道。针对云南省“直过”民族的深度贫困现状，脱贫致富要靠“直过”民族群众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调动贫困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育其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根据习近平精准扶贫关于“精准帮扶”的核心思想，2016 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 年）》，通过采取拔除贫根、转变方式、精准施策、加强帮扶等有力措施，着力实施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安居工程、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 6 大工程 25 个项目，确保扶贫项目向“直过”民族倾斜，重点向“直过”民族中的深度贫困人口倾斜。

（三）精准管理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基础上，为确保“脱贫成效精准”，适时开展贫困对象建档立卡动态管理工作，对脱贫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和考核，建立健全贫困户退出机制，避免出现“数字脱贫”和“不想摘帽”等现象的发生。同时，精准扶贫的实施在于通过对贫困人口的贫困动态监测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从而有效避免返贫的出现。

精准扶贫确立一系列脱贫标准以确保“真脱贫”，核心概括为“两不愁、三保障”，即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到 2020 年，稳定实现“直过”民族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此外，少数民族“直过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各个指标要高于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要确保在现行标准下“直过”民族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掉所有贫困县的帽子，从整体上改变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区域的现状。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贫困地区具体情况做出的符合我国实际的脱贫标准，

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相对于以往的扶贫理论和常规的扶贫模式，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1）强调“精准”二字。对“穷根”的认识要精准，有针对性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这有利于保障贫困群体彻底脱贫；对扶贫的主体、对象和主体要精准，即帮扶谁、谁帮扶、如何帮、帮扶到什么程度等都要有清楚的认识；对如何保证政策落实的责任管理机制设计也要精准，责任到人，监督到位，保证落实。（2）更加关注扶贫的长效机制，内外力结合形成合力。习近平十分关注扶贫力量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注重政府的物质财力的帮扶之外，更加突出“扶智”和“扶志”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培育贫困地区群众脱贫的内在动力和长效机制。（3）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更具系统性和特殊性。首先，精准扶贫不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贫困，而是具有特殊情况下的深度贫困问题。其次，精准扶贫思想对扶贫的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四个阶段进行全方位论述，准确把握扶贫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三、精准扶贫思想构建“直过”民族村落脱贫路径

精准扶贫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贫困人口和家庭的致贫原因分析，因户因人施策，实现可持续脱贫。云南边境金平县拉祜族原名“苦聪人”，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2015年末，金平县“直过”民族聚居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县总贫困人口的22.5%，贫困发生率达26.8%，高于全县贫困发生率近4个百分点。据实地调查发现，由于原始积累贫瘠、空间隔离、“志穷”和“智短”等原因，金平县“直过”拉祜族的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精准扶贫特别强调致贫原因的精准性，通过对“直过”村落脱贫制约因素的分析，找到“贫根”，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以及对金平县“直过”拉祜族脱贫障碍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直过”民族难以脱贫的因素是多元的，必须构建良性互动的后续制度安排，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培育其内在的自生能力和适应能力，使其生产融入现代市场，生活融入现代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最终消灭贫困。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直过”民族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原始积累贫瘠是制约“直过”村落脱贫的历史因素。云南“直过”民族过渡之前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虽然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但生产力水平落后，生产和生活资料积累相当贫瘠，情况异常复杂。具体表现为：（1）大部分土地保留着原始的集中占有形式，还存在许多原始氏族公社残余。（2）“直过区”大多数是母系制家族组织、父系制家庭公社制和地缘性原始村社组织共同交织的社会组织形态。（3）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工具简陋，竹、木、石等工具在其原始生产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4）分配关系呈现二重性。一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共同消费等原始公有制分配关系；二是私有制的产生及分配关系滋生了部分私有观念和剥削因素。（5）商品经济观念淡薄，在许多边远“直过”村寨中仍保留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商品交换的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消费形态单一。

对金平县的“直过”拉祜族林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截至2016年底，林村共49户206人。人均耕地面积3.39亩，但大多位于海拔较高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由于较高的海拔和寒冷的气候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土地承载力非常有限。该村生产资料积累严重不足，生产资料积累贫瘠的直接结果造成了生活资料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落后，生活质量低下。调查发现林村年人均粮食只有300公斤，家畜饲养以猪为主，生猪存栏42头，其他大牲畜40头，家禽存笼569只，食物品种构成比较单调。目前，超过60%的林村村民仍居住在用茅草和树枝搭建的简易居房中，不通电的家户占全村的31.25%，全村未接通移动数据和互联网信号。村内没有垃圾池、排污管等处理设施，只有1间公共卫生厕所，入村道路以土路为主，若遇降雨天气，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近五年，林村因道路基础设施落后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11起。

“直过”民族是从原始的社会制度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制度，这就造成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依然落后于现代社会。根据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等“六个精准”扶贫要求，在“十三五”发展阶段，首先，针对“直过”村落

基础设施仍旧落后的状况开展住房、田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尤其要瞄准贫困村的建档立卡户，通过危房改造等项目确保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道路硬化、用电、移动数据等其他设施的改善和提高。其次，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强“直过”村寨与外界的互联互通，继续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集文化、环境、发展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二）因地制宜选择创收产品，提高“直过”村落和村民的经济收入

自然区位的隔离性是制约“直过”村落脱贫的空间因素。云南“直过”民族由于自然灾害、历史战乱等诸多原因大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原始森林，地理环境隔离和封闭。金平县“直过”拉祜族居住在云南边陲的哀牢山一带海拔 1400 米的高山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极为脆弱。区位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了其要素禀赋条件，一是与光照、温度、土壤肥力、降雨等有关，恶劣的区位条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其次，区位直接决定了与外界沟通的难易程度，博采众长才能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空间贫困”理论和“贫困地理学”研究范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由于自然区位造成贫困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与空间贫困、自然地理特征相关的发展滞后状态通常呈现明显的特征，即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直过”民族呈现四大劣势，区位优势、生态劣势、经济劣势和政治劣势。^{[13][14]}

表 1 林村拉祜族和坝区傣族的作物种植对比

年份	1996	1998	2000	2007
傣族	杂交水稻	橡胶、香蕉	橡胶、香蕉	橡胶、香蕉
拉祜族	普通水稻	普通水稻	杂交水稻	草果、木薯

资料来源：村民、村干部访谈。

如表 1 所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由于空间自然地理特征，海拔较高的林村拉祜族与毗邻而居的坝区傣族在作物品种上存在差异。1996 年傣族开始种植杂交水稻实现了粮食温饱，而同时期拉祜族由于海拔高，种植普通水稻产量低，难以果腹。九十年代，高山拉祜族向坝区傣族村寨乞讨的现象非常普遍。九十年代末橡胶和香蕉种植技术在坝区傣族村寨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傣族收入，甚至许多种植大户的收入达百万。而拉祜族仍由于橡胶种植技术在高海拔地区难以攻克而在种植时间上落后近十年。另外，贫瘠的土壤和土地碎片化很难实现农业产业化种植，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种种空间贫困特征使得林村村民远离政治和市场中心，受教育和享受医疗的难度也因此升高，长期封闭和隔离限制了其经济发展进程。

解决“直过”民族空间贫困问题可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多种方案。（1）发展民族特色产业。“直过”民族村落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多样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如拉祜族手工编织、苗族苗绣和银饰手工艺品等，作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扶植特色产业提高贫困人口家庭经济收入。再如，云南省金平县“直过”拉祜族具有悠久地板蓝根种植和使用历史，板蓝根特色产业化种植可以作为高山“直过”拉祜族的脱贫发展项目之一。（2）针对部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直过”村落，通过其自身发展带动脱贫是相当缓慢的，而仅仅依靠政府投入来扶持成本巨大，效益不高，这种情况下应部分“搬迁一批”。（3）云南民族“直过区”大部分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区，可安排部分贫困人口进行护林、水保、环卫等生态环保公益岗位，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帮助一部分贫困人口通过自己的劳动脱贫，实现“生态补偿脱贫一批”。（4）对于失去劳动能力或其他无法依靠自身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由于特殊原因无法搬迁的一些地区可采取“社会兜底解决一批”。如位于边境沿线的“直过”村落，处于国家间的缓冲带，无法通过易地搬迁项目改善贫困状况，可划分专项资金进行特殊扶持。

（三）着力发展乡村教育，增强“直过”民族内生脱贫动力

“志穷”、“智短”是制约“直过”少数民族村落脱贫的主观因素。虽然通过“直过”政策，从制度和社会形态上“直过”村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外壳，但其内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仍深深地扎根于原始的或封建的农耕社会。如在时间概念上，农耕社会的时间概念与“季节”紧密相关，人们的作息时间很少以时钟作为依据，这与城市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时间观念截然不同。钟表的发明创造了自然节奏外的另一种时间节奏，标志着新的时间观念的产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就导致了“直过”村落居民

劳动的间歇性。这就造成了很多素质论者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归因于“贫困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官员将“直过”拉祜族的贫困和落后归因于“懒惰”。本文认为，“直过”拉祜族人民的“懒惰”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商品经济间不协调所导致的。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人口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生活方式和劳动观念都过度依赖自然环境的变化周期，现代的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缺少在空闲时期通过商品经营来创造获取财富的“智慧”和“志向”。不仅如此，在“直过”村落仍存在吸食和贩卖鸦片的现象。在笔者看来，鸦片对于部分拉祜族老人而言是一种医学“米提斯”²，有许多拉祜族老人吸食鸦片以缓解疾病带来的疼痛。但是，对于普通村民而言，吸食鸦片不仅对肉体和精神带来极大摧残，更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直过”村落许多地区尚处于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的阶段，在边境少数民族村寨中，文盲、半文盲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很高。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直过”民族文盲率的平均水平为 14.47%，远远高于 2010 年云南全省的平均水平 6.03%。在云南省的“直过”民族中，德昂族的文盲率最高，为 19.34%，超出全省平均水平的 13.31 个百分点。文盲率最低的是基诺族 9.09%，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3.06 个百分点。^[15] 针对“直过”民族“等、靠、要”思想严重，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是阻隔“代际贫困”的根本措施，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重点培养贫困群体的谋生技能和生存能力。为了让“直过”贫困人口更好的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政府应该大力加强教育投入。通过教育既可以帮助“直过”民族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树立现代化思想观念。同时也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清除停留在当地社区的落后愚昧观念，改变不良习气，激发当地居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当地政府也可以针对不同少数民族人口就业能力提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尤其注重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地方扶贫部门通过进一步完善建档立卡数据库，将贫困户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技能、家庭成员等基本信息汇总整理，按照贫困人口需求和自身特点，年轻的、具备较强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由政府组织劳务输出，鼓励前往县城、州府等大城市务工。年龄较大且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政府与当地企业、种植大户合作，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政府社会保障政策进行社会兜底。通过鼓励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直过”民族的就业能力，“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营造内生脱贫动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解读，结合云南省“直过”拉祜族个案林村的致贫成因分析，探索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导“直过”民族村落脱贫的几条有效路径，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扶贫项目和资金持续瞄准“直过”民族村落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二是发展特色产业，提高“直过”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三是提高“直过区”教育水平，营造民族内生脱贫动力。

云南省“直过”拉祜族个案的实地调查研究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探讨了当地的贫困现状和成因，而在于反映了民族“直过区”，乃至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总的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关键时期的新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对于解决特殊原因导致的深度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针对这种深度贫困和区域范围内普遍贫困的特点，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关键在于“精准”，能够真正瞄准深度贫困人口，强调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避免了“大水漫灌”似的扶贫方式所导致的扶贫成果低效和财政资金浪费等问题，是指导我国“直过”民族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自强、伍国勇、徐平. 民族地区农户贫困的逻辑再塑：贫困恶性循环的视角[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1):69-72.

[2]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资料汇编[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² “米提斯”概念来自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文中将“米提斯”比作实践的知识。斯科特认为“米提斯”的概念比“本土知识、民间智慧”等更强调经验性和实践性。

-
- [3] Aghion P, Bolton P. A theory of trickle - 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 (64) : 151 -172.
- [4] Aghion P. et 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04) : 615 -660.
- [5] 张云钢. 云南民族地区、贫困山区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的条件及阶段目标[J]. 经济问题探索. 1994, (01): 60-61.
- [6] 赵和楠, 侯石安, 祁毓.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难点与改进建议——基于四省民族贫困区的调查[J]. 学习与实践 2017, (2):51-60.
- [7] 陈成文. 从“内卷化”看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矫正机制设计[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1):36-44.
- [8] 张鸿雁. “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现代性建构[J]. 探索与争鸣, 2016, (01):12-17.
- [9] 新华社. 汪洋: 加快“直过民族”脱贫步伐[J]. 老区建设. 2016, (1):7.
- [10] 习近平. 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N]. 人民日报, 2015 年 6 月 20 日。
-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278.
- [12] 习近平. 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87.
- [13] Burke W J, Jayne T S. Spatial disadvantages or spatial poverty traps: household evidence from rural Kenya. [J]. MSU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93, 2008
- [14] Bird K, McKay A, Shinyekwa I. Isolation and pover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access to goods and services and poverty [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PR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Spatial Poverty Trap, 29 March 2007.
- [15] 杨海波. 云南直过民族人文贫困现状研究[J]. 邢台学院学报. 2014, 29(02):19-21.